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

田海龙

(天津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摘要: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从批评的视角研究语篇,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而且不仅是术语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批评话语分析是对批评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批评语言学运用功能语法对文本进行分析,试图建立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一对一的直接联系。批评话语分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媒介建构的,并发展出“话语实践”和“社会认知”等多种学说。在批评与被批评的讨论中,批评话语分析坚持“批评”之内核,更多的从批评社会科学汲取营养,建立起话语与社会的超学科对话体系,拓展了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显现出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语篇研究;批评视角;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继承并发展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43(2006)02-0040-08

1.0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讨论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篇”和“批评”这两个特定的概念。关于“批评”,有许多定义和阐释(如 Fairclough, 1985:747/1989:5; Wodak, 2001:9; Locke, 2004:25-39),总体来讲,“批评”就是揭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真正认识这一点,首先要承认一个人们熟视无睹却客观存在的事实:即语言运用以及以此为体现形式的社会实践要靠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加以维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认识到将这些习以为常的、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明朗化即是“批评”的使命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批评”的使命还在于其目的是使社会发生变革,“批评即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Hammersley, 1997)

所谓语篇(discourse),亦翻译成话语。从批评的角度看,语篇具有弥散性,无处不在,是社会实践的形式,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语篇存在于大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对社会实践产生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语篇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折射社会现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因此,语篇不仅成为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而且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社会机构、政党、新闻媒体都可以运用语篇

参与社会变革。(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从批评的视角看语篇,语篇就不同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视野中的语篇。形式主义的语篇观认为语篇是超出句子的语言单位,与词素、小句一样同属语言的等级系统之中。(Schiffirin, 1994:24)在此基础上,语篇分析被认为是研究小句或句子之上的语言结构以及篇章和会话这样更大的语言单位。(Stubbs, 1983:2)虽然这种研究试图摆脱西方主流语言学把语言作为封闭的抽象系统进行研究的束缚,试图把研究对象由“语言”转向“言语”,但其语言思想仍囿于形式主义的桎梏之中,对语篇的研究也仅限于话语的内部结构上,把语篇的理想化形式作为研究的目标。功能主义的语篇观认为语篇即语言运用(Fasold, 1990:65; Brown & Yule, 1983:1),是具体情景作用于语码的结果,是意义商讨的语用过程(Widdowson, 1996)。这种研究虽然摒弃了形式主义注重结构分析的方法,转向研究语篇模式、交际目的以及语境对意义的决定作用,甚至涉及到语言运用中的权力关系(Thomas, 1985),但是,仍然没有将语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没有试图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所涉及的语篇运用中的权力关系也仅仅是个人之间而不是社会团体或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BYY024)资助。

收稿时间:2005-11-20

作者简介:田海龙,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话语研究。

构之间的权力关系。(田海龙、张迈曾,2006)

从批评的视角研究语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熟于世纪之交,经历了一个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本文通过对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及核心内容的评述,通过对二者的批评及反批评的讨论,再现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发展过程。这一再现不仅呈现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区别,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区别并非仅是术语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这种区别体现着批评话语分析对批评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体现着语篇研究中批评视角的拓宽以及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巨大潜力。

2.0 批评语言学

2.1 形成: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反动

批评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主要思想体现在1979年同时问世的两本书:*Language and Control* (Fowler et al., 1979)和*Language as Ideology* (Kress and Hodge, 1979, 修订版为Hodge and Kress, 1993)。Fowler (1991)本人也提到,批评语言学始于他们的著作。但是,论及批评语言学的形成也不能忽视*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Halliday, 1978)的作用,因为系统功能语法对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最为重要。(Wodak, 2001:3)批评语言学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

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心灵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思想流派占据着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这种思想认为语言是一个中立的、固定不变的、并且与社会分离的抽象系统。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主流语言学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索绪尔的“语言”和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上,对他们区分出的“言语”和“语言运用”则不屑一顾。批评语言学完全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将语言研究与其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使语言研究由静态走向动态。借助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批评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一个供选择的系统,认为任何语言形式的选择都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并具有意义。意义不是事先由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来确定的某种实体或关系,而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批评语言学在对主流语言学提出挑战的同时,还对以Labov为代表的早期社会语言学(变异社会语言学)提出批评。Labov (1997 [1972]:175)对语言变异的研究第一次把语言运用和社会因素联系起

来,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但是,批评语言学认为,这种联系仅是一种简单的伴随关系,语言变体在Labov的研究中仅是表明言者的社会地位而已,并没有表明语言对社会的作用。社会语言学仅表明社会结构对语言运用的影响,而批评语言学则试图研究语言运用如何确认和加强社会结构,如何建立和保持社会结构。(Fowler & Kress, 1979:190)

批评语言学的形成迎合了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是对已形成的许多旧的思维定式的反叛。它的特点及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主要是: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本质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也不存在某种“基础”或“中心”;后现代主义反对存在确定的意义,认为意义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而且认为符号对所指本身产生影响:当代社会是一个符号快速增长的社会,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这个社会;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静止的、自足的结构;后现代主义强调事物的多元性和研究的多视角。在语言研究方面,后现代主义追求语言研究的多视角,摈弃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摈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确立“意义观”,认为意义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事先由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来确定的某种实体或关系。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考虑词与物的关系,认为符号的能指不但与所指密不可分,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所指。(于鑫,2004)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构成了批评语言学形成的历史环境。

2.2 核心: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直接关系

基于与主流语言学完全不同的语言思想,批评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研究诸如不平等、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来揭示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并通过语言的运用建立和维系社会组织间的权力关系。批评语言学强调对文本的实际分析,注重通过文本的语法分析来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企图建立一种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直接关系。在这里,批评语言学将系统功能语法综合运用于文本分析,具体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事件、状态、过程的及物性分析;2)言者与听者相互关系的情态分析;3)语言材料的转换分析;4)语言顺序的分类分析;5)语篇的连贯性分析。(Fowler & Kress, 1979:198 - 213)

批评语言学在功能语法分析基础上建立的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直接的、一对一的。例如,

分析两个新闻语篇对警察与示威者冲突这一相同事件的报道,借助功能语法对小句动词过程的及物性进行分析可得出结论:使用“*The police shot 100 demonstrators.*”这一物质过程进行报道的语篇较使用“*100 demonstrators are dead.*”这一关系过程进行报道的语篇更多的含有语篇生产者“谴责警察、同情示威者”的思想。这种将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一对一地直接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批评语言学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它区别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分水岭。

2.3 缺陷: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

批评语言学在其十年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不完整的一面。最初参与研究的英国东安吉利大学的四位学者也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Kress(1989)发现批评语言学家总是局限在现存文本的分析之中,而且在文本分析中,语言系统和社会基础间的关系呈现出一对一的固定模式。Fowler(1991)也承认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取材过于零碎。Fairclough(1989: 28-29)总结了批评语言学有待改进的三个方面:1)文本被当作终结的产品进行分析,文本产生和解释的过程往往不被重视;2)单方面强调话语对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再生成的影响,结果忽略了话语是社会斗争的场所以及话语变化亦是社会文化变化这两个方面;3)语言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在批评语言学中虽有所涉及,但界面太窄。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批评语言学在四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评语言学对话语作用的强调是单向而不是辩证的。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话语之中,话语对再现这些社会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话语也是社会斗争的场所,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话语来实施其权力,也就是说,话语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批评语言学的研究集中在话语再现社会关系的作用方面;尽管其初衷也要研究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但在实际研究中忽略了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关系,而是把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当作一种静态的关系去研究,注重社会结构而忽略社会活动,注重社会再现而忽略社会变革。

其次,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忽略了话语参与者和话语分析者对文本的动态分析过程。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话语参与者根据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文本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对文本进行解释分析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存在着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另一方面存在着分析者的立场与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而批评语言学仅注重研究话语与权力、

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没有对话语分析者在话语分析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文本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在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中被视为一种固定的、直接的、透明的关系。批评语言学试图通过文本的功能语法分析揭示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一种语言结构,如被动语态,被机械地赋予一种价值或意识形态,似乎文本特征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对一的简单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一成不变。

第四,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仅局限在语法和词汇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没有延伸到整个文本的结构;也没有研究会话结构(如 turn taking)的意识形态意义,更没有注意研究文本解释的过程以及言者和分析者在解释中的作用。所以,尽管批评语言学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来研究社会现实,但是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界面在批评语言学中不够全面,没有涉及语法和词汇以外的范围,如文章结构、修辞手段等等。

3.0 批评话语分析

3.1 形成:批评语言学的发展与批评视角的拓宽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一个发展阶段始于1989年。Wodak(2001:4)将这一阶段的形成性标志表述为几本书、一份期刊和一个会议。*Language and Power* (Fairclough, 1989)、*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Wodak, 1989)以及 *Prejudice in Discourse* (van Dijk, 1984)可以说在认识论上标志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199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Teun van Dijk教授创办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期刊 *Discourse & Society*,使批评话语分析的综述及原创性文章有了发表的园地,特别是1993年的批评话语分析专刊使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得到了张扬。199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支持下,Teun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和Ruth Wodak等批评话语分析家聚首阿姆斯特丹,用了两天的时间讨论了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确定了一个交流项目和许多合作研究项目。阿姆斯特丹会议标志着批评话语分析的机构性形成。

批评话语分析在弥补批评语言学的缺陷、坚持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内核的同时,拓宽了批评语言学的批评视角。在术语使用上,批评话语分析沿用批评语言学中的“批评”二字,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坚持了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内核;舍弃“语言学”而

采用“话语”则表明批评话语分析不局限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之中,而是接受社会科学中“话语”的概念(如 Foucault, 1972, 1984 关于话语的论述),吸收批评社会科学和对后现代社会变革批评研究的成果,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运用;至于“分析”则是强调批评话语分析的解释(interpretation)作用,批评话语分析家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来证明话语生产者的权力运用并表明分析家本身对社会变革的参与。批评话语分析较批评语言学是一个目前使用更为频繁的术语(Wodak, 2001: 1),虽然 Fowler et al. (1979) 和 Hodge & Kress (1979/ 1993) 分别使用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这两个术语。我国也是如此。尽管二者有时也互换使用,如廖益清(2000)、辛斌(1996, 2000),或沿用批评语言学,如高一虹(2001)认为 Fairclough 是批评语言学的代表,但批评话语分析还是被广泛用来覆盖批评语言学,如廖益清(1999)、江晓红(2003)、王晋军(2002)、张延续(1998)、陈中竺(1995)。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也表明批评话语分析较批评语言学已有长足的发展,并形成自身的研究特点,甚至与批评语言学形成明显区别。

在内容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强调分析者的立场在研究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分析本身就是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注重分析连接语言与社会的媒介,同时,文本分析的范围也扩展到文章结构、修辞手段、文体、叙事等范围。(van Dijk, 1993, 2001) 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认识更加深刻,对话语分析的框架更加完善和全面,使批评话语分析更加注重话语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更加明确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把研究话语分析者在文本分析中的作用纳入认识论的研究,强调对话语的多学科和超学科研究,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既是理论也是实践。(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 Fairclough & Wodak (1997: 271 - 280) 概括为: 1) 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 2) 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 3) 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或变化的场所; 4) 话语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 5) 话语是历史的,它应被置于语境中加以考察; 6) 文本与社会的关系经由中介产生,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 7) 对文本结构不仅仅描述,更注重解释; 8) 话语是社会活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

3.2 核心:文本与社会的关系经由中介体产生

分析 Fairclough & Wodak (1997) 概括的批评话语分析的 8 个原则,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批评话语分析对批评语言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认为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是历史的,以及对文本结构不仅仅描述,更注重解释,甚至认为话语是社会活动的形式,所有这些都都可以看作是对批评语言学“批评”内核的继承,惟有在文本与社会的关系经由中介产生以及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甚至修正了批评语言学的认识。批评语言学运用功能语法试图建立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一对一的直接联系,而批评话语分析则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由中介体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中介体的研究形成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同时,在对这个中介体的研究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以 Fairclough 为代表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学说,以 van Dijk 为代表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学说,以 Wodak 为代表的“历史话语分析(historical-discourse analysis)”学说(Reisigl & Wodak, 2001),以及 Scollon 的“媒介话语分析(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学说(Scollon, 2001)和 Chilton 的“认知语言分析(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学说。(Chilton, 2003) 下面以 van Dijk 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来说明批评话语分析对存在于文本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体的研究。

van Dijk 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认清并且抗争不平等和不公正;而不平等和不公正就涉及权力的滥用,所以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权力。权力意味着控制,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根据 van Dijk 的学说,控制分为行动型控制和认知型控制:前者为掌握权力一方对另一方行动自由的限制,后者为对思维的影响。除了像警察对待示威者或军事和法律的直接行为控制以外,大部分现代的、更有效的权力具有认知性,通过说服、干预或其它策略来改变别人的思想,例如通过知识、信仰、理解、计划、态度、思想意识、规范和价值观来实现对思想的控制。van Dijk 将社会结构、群体、关系以及诸如解释、思维和争辩、推理和学习等思维活动的“社会公认的再生产形式”定义为社会认知。(van Dijk, 1993)

社会认知是社会公认的再生产形式,这里“再生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再生产什么?从话语

生产方面看,话语结构再生产(再现)社会结构,从而生产出话语;从话语消费(解释)方面看,社会结构再生产话语,从而解释话语。不论是话语生产还是话语消费,“再生产”预设一个道理:话语结构与社会认知相连,而社会认知又与社会结构相连。(van Dijk, 1993)这里,社会认知成为连接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媒介,“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的心理构建和解读才能与话语结构直接联系起来。”(van Dijk, 1998)

社会认知在话语生产过程中首先反映在统治者对形势/情景的介入方式的控制上。例如,国会议员在生产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语的时候,就对场所、时间、会场布置以及哪些人可以参加、哪些人不可以参加有明确规定,而这些规定是被社会公认的,是一种社会认知形式。对介入方式的控制不仅局限在情景方面,而且存在于对话语本身的控制:一些“声音”被检查,一些意见被冷落,一些视角被忽略。例如在法庭上,法官组织法庭调查,决定发言顺序,设定发言题目,允许或禁止某种言语行为。所有这些都当作规定、规则或法律接受下来。“我们没有权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随心所欲,而且并非每个人都有权力随心所欲——这些我们非常清楚。”(Foucault, 1984:109)可见,话语的生产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公认才可实现,也就是说,话语结构再现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认知才能实现。

社会认知在话语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并非明显。van Dijk 认为,作为被统治群体的一员,要解读话语,发现其中的统治行为,就要认识统治者惯用的两个策略:(1)确认和合法化:统治者取得社会资源的特权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也是必须的;(2)否认: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并享有平等的社会资源,不存在统治现象。而且,还要认识统治者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惯用伎俩:正面再现自己的集团,并且负面再现对方的集团。有了这些“社会认知”,就会发现话语中的许多策略体现统治行为,如:对事实的负面评价;对对方错误行为和我方正确行为的夸张;对我方负面行为的婉转、否认和低调处理;选择含有褒贬的词汇;在叙述方面用个人经历的方式讲述不利事件,对事件的错误特征详细描述;对对方的错误行为在结构上进行强调,如在新闻报道的标题、开头和结尾部分强调,在小句的及物性结构中明显标识错误行为的实施者;在新闻报道中引用可靠证人和专家的言语。(van Dijk, 1993)这样,社会认知又将话语结构

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社会结构再生产话语。

社会认知包括整个社会公认的知识、态度以及思想,因此代表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就具体文本的生产和解读而言,单独的、个人的以及情景化的具体模式起着决定作用。“模式”使我们个人与社会、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个人思想和经历与包括权力在内的集团态度和集团关系联系起来。批评话语分析从社会认知这个媒介入手解读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就要分析具体的话语结构怎样决定具体的心理过程或促进具体社会再现的形成。例如,分析语义结构对社会态度的形成或变化的直接作用,就可分析个人模式对具体事件的综合或再情景化间接形成或改变社会态度的过程。

3.3 批评与反批评:批评话语分析的完善

批评话语分析经过几年的发展,到 90 年代中期已形成学术特色,同时也遇到来自语用学、文体学和会话分析的批评。Widdowson (2002 [1995, 1996]), Toolan (2002 [1997]), Stubbs (2002 [1997]), Hammersley (1997) 等人对批评话语分析相继提出批评。批评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1) 批评话语分析带有政治责任 (political commitment)。Stubbs 称这种政治责任是“循环”,他认为“分析家一开始就完全知道他们要发现的政治立场是什么”。(2002 [1997] (vol. III): 208) Widdowson 也批评批评话语分析从某一特定观点出发对文本进行带倾向性的解释,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术语是“分析”,实质却是“解释”,相互矛盾 (2002 [1995] (vol. III): 134)。Toolan 对批评话语分析倡导的社会建构的效果提出质疑。他强调说,需要批评话语分析规定变革的发生与真正引发变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2002 [1997] (vol. III): 227), 因此,他对批评话语分析对一个种族主义者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是否可直接导致事实的变化表示怀疑 (同上: 224)。

(2) 批评话语分析缺乏理论基础。Toolan (Toolan, 2002 [1997] (vol. III): 211) 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忽略了现代有关语言与思想关系的大量文献论述,没有提到 Whorf 学说,没有提到 Searle (1995) 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一书中对语言行为与机构事实间关系的精辟论述,也没有讨论隐喻和习语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也论述不够,对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直接关系只是偶尔提及、简要概括或简单参考,没有详尽说明。

(3) 批评话语分析的文本收集和分析缺乏系统性。批评话语分析所分析的文本只是一个文本的片

段,而且文本的量也不大;至于怎样收集文本(数据),以及文本的代表性更少有讨论。他还批评以翻译文本作为分析数据的做法有悖批评话语分析的初衷。(Stubbs,2002[1997](vol. III):209-210)而Widdowson则更是认为很难将语言数据的分析与社会数据的分析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承认话语是社会环境中的语言运用,但是他认为,要么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分析数据,将话语限制在语言学的范畴之内;要么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数据,把话语限制在社会学的范畴之内。批评话语分析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总是存在区别,一种探索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优先于另一种。……怎样选择素材和赋予素材的意义肯定在程度上是不同的。”(2002[1995]:133)

面对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批评话语分析的倡导者及时开展反批评,宣传自己的主张。例如,关于批评话语的政治责任,Fairclough回应道:批评话语分析的参与者确实有明显的政治使命这一特征,他们发现社会的弊端,发现语言在其中作梗,从而要运用语言来干预并实现社会变革。(2002[1996](vol. III):151)van Dijk(2001:96)甚至认为这是值得批评话语分析骄傲的事。我国学者也对这些批评与反批评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辛斌(2004)针对批评话语分析在其分析的客观性方面遭遇的批评,讨论了分析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自己立场观点的问题。他从西方传统解释学的角度提出“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唯有偏见才能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辛斌,2004:65),进而指出这类批评有失公允。

经过批评与反批评,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进一步拓宽,批评话语分析更加完善。例如,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从批评社会科学和对后现代社会变革的批评研究中为批评话语分析建构理论基础,使批评话语分析从社会学汲取营养,从语言的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乃至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

4.0 结语:目前的情况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体现出从批评视角进行语篇研究的潜力。目前,从语篇的角度研究社会问题已成为一个领域,成果层出不穷,如对社会福利“改革”的研究(Fairclough,2000),对国家特征的研究(Wodak,1999),对传销的研究(Kong,2001),对“9.11事件”的研究(Chilton,2001)。在创办 *Discourse & Society* 十年之后, van Dijk 于 1999 年

又创刊了 *Discourse Studies*,之后 Wodak 和 Chilton 在 2002 年创办了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Fairclough 在 2004 创办了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这些学术期刊适应了从批评视角进行语篇研究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了批评性语篇研究的园地。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也正在深入。批评话语分析已成为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2004 济南)、首届多元文化话语国际研讨会(2004 杭州)、以及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2005 广州)的一个议题,而且还将成为“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研讨会(2006 天津)的一个主题。虽然近几年研究多为综述性的文章(如丁建新、廖益清,2001;戴炜华、高军,2002;陈忠华、杨春苑、赵明炜,2002;田海龙,2003),却也有从语篇的批评视角研究社会问题的成果发表(如田海龙,2004;徐涛、张迈曾,2004)。所有这些都是为“确立文本分析和由此产生的语言分析在社会科学分析中的实质性地位”(Fairclough,1996)而努力。

* 本研究得益于南开大学张迈曾教授为语言学博士生讲授的《语言与思想》、《话语与社会变革》、《语言、文体及身份》等课程,谨此表示敬意。

注释:

Blommaert(2005:14)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是 Fairclough, van Dijk, Wodak, Chilton. 我们认为 Scollon 的研究也在此列。

Fairclough 提出超学科研究的概念来强调批评性语篇研究在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中,一种理论逻辑在另一种理论逻辑的丰富、扩展中得以实施,而不是简单地将后者还原为前者。参见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Fairclough 2000;高一虹 2001。

参考文献

- [1] Blommaert, J.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Chilton, P. Do Something!: Conceptualising Responses to Attacks of 11 September[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01, 1(1): 181-195.
- [4]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5]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Fairclough, N. Critical and Descriptive Goals in Discourse Analysi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5, (9):737 - 763.
- [7]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 Longman, 1989.
- [8] Fairclough, N. 1996. A Reply to Widdowson's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Review".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II) 2002.
- [9] Fairclough, N. Discours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f Welfare Reform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 4/2:163 - 195.
- [10]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 1997. 258 - 284.
- [11]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M]. Beijing: FLTRP and Blackwell, 1990/2000.
- [12] 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13]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M. J.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1984:108 - 138.
- [14]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and Trew, T.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M].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15] Fowler, R. 1991. On Critical Linguistics[A].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C]. (vol. I), 2002.
- [16] Fowler, R. & Kress, G. Critical Linguistics[A]. In Fowler et al.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 [C]. 1979:198 - 213.
- [17]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1978.
- [18] Hammersley, M. On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97, 17(3):237 - 248.
- [19] Hodge, R. & Kress, G. *Language as Ide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1993.
- [20] Kong, Kenneth C. C. Marketing of Belief: Intertextu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Marketer's Identity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1, 12 (4):473 - 503.
- [21] Kress, G. History and Language: Towards a Social Account of Linguistic Chang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9, (13):445 - 466.
- [22] Labov, W. 1972.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Department Stores[A]. In Coupland &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C]. 1997.
- [23] Locke, Terr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24] Reisigl, M. & Wodak, R.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5] Scollon, R. *Mediated Discourse: The Nexus of Practic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6] Schiffrin, 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M]. Oxford: Blackwell, 1994.
- [27] Searle, J.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M].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
- [28] Stubbs, M. *Discourse Analys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 [29] Stubbs, 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DA[A].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II) [C]. 2002.
- [30] Thomas, J. The Language of Power[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5, 9:765 - 783.
- [31] Toolan, M. 1997.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A].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I) 2002.
- [32] Van Dijk, T. A. *Prejudice in Discourse*[M]. Amsterdam: Benjamins, 1984.
- [33] van Dijk, T.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 2002:104 - 141.
- [34] van Dijk, T. A. 1998.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 the Press [A]. In Bell &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C]. 1998 :21 - 63.
- [35] van Dijk, T.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A]. In Wodak & Meyer (eds.). 2001 :95 - 120.
- [36] Widdowson, H. G.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Review [A].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I). 2002.
- [37] Widdowson, H. G. 1996. Reply to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A].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I). 2002 :156 - 169.
- [38] Wodak, R.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89.
- [39] Wodak, R.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J]. *Discourse & Society*, 1999, 10(2) : 149 - 173.
- [40] Wodak, R. What CDA is about -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A]. In Wodak &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2001 :1 - 13.
- [41] 陈忠华, 杨春苑, 赵明炜. 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J]. 外语学刊, 2002, (1) :82 - 86.
- [42] 陈中竺. 批评语言学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1) :21 - 27.
- [43] 戴炜华, 高军. 批评语篇分析: 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 外国语, 2002, (6) :42 - 48.
- [44] 丁建新, 廖益清. 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 当代语言学, 2001, (4) :305 - 310.
- [45] 高一虹. 《社会语言学通览》导读[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2001 :F23-F32.
- [46] 江晓红. 批评话语分析的有效工具[J]. 学术交流, 2003, (7) :132 - 135.
- [47] 廖益清. 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1999, (2) :1 - 5.
- [48] 廖益清. 批评话语分析综述[J].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 (1) :76 - 82.
- [49] 田海龙. 《后现代生活中的话语: 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3) : 318 - 320.
- [50] 田海龙. 病历报告: 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J].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4, (1) :113 - 124.
- [51] 田海龙, 张迈曾. 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 语用学与社会学研究[J]. 外语学刊, 2006, 待出.
- [52] 王晋军. CDA 与 SHL 关系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02, (6) :101 - 103.
- [53] 辛斌.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 批评语言学[J]. 现代外语, 1996, (1) :21 - 26.
- [54] 辛斌.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 外语教学, 2000, (4) :44 - 48.
- [55] 辛斌. 批评性语篇分析: 问题与讨论[J]. 外国语, 2004, (5) :64 - 69.
- [56] 徐涛, 张迈曾. 高等教育话语的新变迁——机构身份再构建的跨学科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3) :107 - 109.
- [57] 于鑫.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语言符号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3) :33 - 37.
- [58] 张延续. 批评话语分析与大众语篇[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6) :24 - 27.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Discourse Studies: From Critical Linguistics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ian Hai-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Commerce University,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Both critical linguistics (CL)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pproach discourse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but there is stil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it is not a mere difference in technical terms or developmental stages. Rather, CDA develops CL. CL attempts to build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ext. CDA, on the basis of a critical review of CL attempt, argues that suc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indirect and mediated, and in its argumentation comes out Fairclough's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van Dijk's "social cognition." While being criticized by and criticizing others, as well as drawing on critical social sciences, CDA expands its critical perspective to a transdisciplinary bridging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anticipating a great potential for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Key words: discourse studies; critical perspective; critical linguistic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evelopment